



编辑/王渊 见习编辑/张倩 校对/台震霄

电子信箱: Lhaizhoukan@126.com

2025年12月26日 星期五



人物



柳宗元

柳宗元(773年—819年),字子厚,出生于长安(今陕西省西安市),祖籍河东郡(今山西省运城市一带),唐代文学家、思想家,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,其事迹见于新旧《唐书·柳宗元传》《柳河东集》,代表作有《江雪》《黔之驴》《封建论》和《永州八记》等。《断刑论》是柳宗元所写的一篇政论,分为上下两篇,学界多认为上篇已佚,现存内容为下篇。文中,柳宗元对“赏以春夏,刑以秋冬”的传统理论持反对观点,并将这一观点上升到治国理政层面,认为应当坚持包括“去大惑”与“立大中”两个方面的“圣入之道”。所谓“去大惑”即破除“天人感应”“赏刑顺天时”等虚妄观念,“立大中”即既不机械固守成规,也不肆意妄加变通,而是以“经”(根本原则、常行之法)为根基,以“权”(因时制宜的灵活策略)为手段,让二者相辅相成。正如柳宗元在《时令论》中所言:“立大中,去大惑,舍是而曰圣人之道,吾未之信也。”《断刑论》是柳宗元哲学思想与政治主张在法律层面的体现,内容批判传统、质疑成说、针砭时弊,富有革故鼎新之意,深刻反映出柳宗元“赏罚及时”“天人相分”“经权合一”的法律观。

第一,继承“赏罚并用”,主张“赏罚及时”。“赏”和“罚”历来被认为是治国理政的两种重要手段。《中鉴·政体》中指出:“赏罚,政之柄也……赏以劝善,罚以惩恶。”《傅子·治体》中指出:“治国有二柄:一曰赏,二曰罚。赏者,政之大德也;罚者,政之大威也。”据《贞观政要·封建》记载,唐太宗李世民高度重视“赏”和“罚”的作用:“国家大事,惟赏与罚。当其赏,无功者自退;罚当其罪,为恶者咸惧。”柳宗元对此表示充分肯定,但旗帜鲜明地反对“赏以春夏,刑以秋冬”的传统做法。“赏以春夏,刑以秋冬”这一理论将赏、刑的时间与四季的变化相关联,认为应在春、夏两季实行奖赏,在秋、冬两季施加刑罚。柳宗元指出,这一所谓的“至理”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,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:如果一个人在秋、冬两季做了善事,却要等到来年的春、夏两季方能获奖赏,那么做善事的人难免会急于行善;如果一个人在春、夏两季行不善之事,也只能等到秋、冬两季受罚,那么这些人就会更加恣意妄为。这种“缓而慢之”的做法导致“赏”和“罚”无法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,也是“刑措”(即刑罚搁置不用)的理想状态难以实现的原因所在。因此,柳宗元提出“赏务速而后有功,罚务速而后有惩”的观点,强调无论是“赏”还是“罚”,都应做到“不越月逾时”,使行善之举及时得到奖赏,不善之事及时受到惩罚,如此才能使天下之人“从善远罪”,最终达到“刑措”的治世境界。

第二,驳斥“顺时得天”,阐释“天人相分”。在柳宗元所提倡的“圣入之道”中,“去大惑”是“立大中”的前提。柳宗元认可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所提出的“明于天人之分”的观点,指出自然现象与人事变化并无直接联系,“务言天而不言人”是“惑”的表现,“谋人心”要比一味“顺天时”更加重要。就“刑以秋冬”(又称“秋冬行刑”,中国古代司法中关于死刑执行的一项制度)而言,其理论基础是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“天人感应”理论和阴阳五行学说。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》中提到“罚为秋,刑为冬”。明代思想家丘濬亦持此论:“刑者,阴事也。阴道属义。人君奉天出治,当顺天道肃杀之威,而施刑害杀戮之事。”《唐律疏议·断狱》“立春后秋分前不决死刑”条更是明确规定:“诸立春以后、秋分以前决死刑者,徒一年。”柳宗元反对这种“顺天时”的做法予以驳斥,他认为,受刑者但求一死,却要经历漫长的羁押等待,生活上“饥不得时而食,渴不得时而饮”,当暑热天气来临时更是“痒不得搔,痹不得搔,痛不得摩”,受尽折磨。这实际上是“逆天时”“惑于道”的做法,是对“顺时得天”的曲解、对“圣入之道”的歪曲。此外,将刑罚执行与自然气象相类比的论证也是“惑”的表现。柳宗元认为,雷震雪霜“特一气耳,非有心于物者也”,秋、冬两季雪霜虽会使万物凋零,但春、夏两季也有雷电裂木破石,难道草木、巨石犯了什么特殊的罪行吗?“苍苍者焉能与吾事而暇知之哉?”在他看来,这些自然气象并没有惩罚万物的主观意志,所以这种类比论证实则是牵强附会。

第三,深化“经达权变”,强调“经权合一”。柳宗元指出,“经”与“权”是后人对治国理政方略的生命命题,“当”才是对二者最恰当的概括,而“当”正是“大中之道”的核心要义。他在《与杨诲之疏解车义第二书》中提到“圣人所贵乎中者,能时其时也”,意思是说圣人所提倡的“大中之道”,不是一味地顺应天时,而是将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,把握时机、顺势而为,将“大中(当)”与“经”“权”的关系是道和器、体和用的关系。

“经达权变”语出《三国志·魏书·荀彧荀攸贾诩传》:“荀攸、贾诩,庶乎算无遗策,经达权变,其良、平之亚欤!”意思是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策略,不拘泥于现实。关于“经”和“权”的关系,《公羊传·桓公十一年》认为,“权者反于经,然后有善者也”。柳宗元概括道:“权也者,达经者也。”“权”是实现“经”的手段,二者“皆仁智之事也”。这里的“经”指的是常行之法,“权”则指的是变通之法。

在中华法制文明史上,律和例的关系就是反映“经”“权”关系的典型。清代的基本法典《大清律例》于乾隆五年(1740年)颁布定型,此后律文基本保持不变,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,乾隆十一年(1746年)确立例文“五年一小修,十年一大修”的原则。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在《历代刑法考·律例》中指出:“律者,一成不易者也;例者,因时制宜者也。”柳宗元基于“经达权变”提出了“经权合一”,认为“经”和“权”相辅相成,不可割裂,只有将二者“合之于一而不疑”,方能在“去大惑”的前提下进一步“立大中”,实现“圣入之道”。

《断刑论》全文论证由小及大、由表及里、由浅入深,从刑罚执行的具体制度上升到治国理政的宏观方略,概念界定精准、论证逻辑严密,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和强烈的现实意义。尤其结尾“古之所以言天者,盖以愚蚕蚩吾人,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”一句,更是石破天惊、振聋发聩,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体现出进步的一面。这篇政论所反映的柳宗元“赏罚及时”“天人相分”“经权合一”的法律观,在中国法制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【作者单位:西北政法大学。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《中华法系基层治理的多元一体规范保障研究(22JJD820020)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】

天人本两分 赏罚要及时

——《断刑论》蕴藏柳宗元的法律观

王斌通

张南征



案例

是一位失业的、年轻无助的母亲,其在抚育年仅两岁的幼儿过程中,因饥饿盗走面包店里的面包,在法律上确实有罪,但法官在裁判中指出,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,一位母亲竟然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难以糊口,对于此种境况,法官可以,也应当人道地解释不灵活的法律规定,当人们在无法抵御的饥饿驱使下行动的时候,其责任应得到豁免。

不难发现,古今中外,尽管法律及司法制度存在差异,但人们对良法善治的期待从未改变,法律秩序需要维持,但更应顾及天理和人情。饥饿致盗,无论是为侍奉母亲,还是为抚育幼儿,抑或是出于求生的本能,既关涉伦理道德,又源自人之常情。正如刑法学界所讨论的,只要是普通入道德上能够接受的,那就应该采取消极道德主义原则,可以将动机、情节作为出罪的理由,无论是刑罚的减缓,还是赦免,均属正当。当然,由满足最低生存需要的盗窃,发展至抢夺,甚至持械伤人,就不能无原则地宽免,否则法律的威慑力荡然无存,社会秩序也会愈加紊乱。

关于饥饿致盗是否应予以处罚,或者处以重刑,显然没有标准答案。而这类讨论也在提醒司法者,刑法的适用绝非教条地简单套用用法,而是需要基于特定的情境,对法律、道德与人情反复权衡,在个体的基本权利与社会秩序间寻求平衡,最终作出更公正、更得民心的裁断。

（作者单位: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）

然会残害良善百姓。唯有对这些罪犯从严追捕,依法处以死刑或流刑,才能恢复社会安定。若朝廷颁发敕令明确予以减免刑罚,无异于变相怂恿百姓盗窃,只会让社会秩序更加紊乱。对于缺衣少食的百姓,恰当的做法是减轻税赋徭役,开仓放粮,使其免于饥饿,而不是宽纵他们劫夺粮食。否则,这样看似宽仁的法令,最终只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,本意是救人,但可能导致更多人死亡。北宋天圣年间刑部尚书杨安国也持类似观点:对于无心过误之犯罪,或者迫不得已的盗窃行为,特别是在灾荒之年,可适用缓刑,或者予以赦免,以体现对穷苦百姓难以为生的怜悯。但对于持凶器抢劫粮仓者,若不分轻重一律予以宽免,恐怕不足以威慑犯罪者。但面对反对意见,宅心仁厚的宋仁宗不以为然,他称天下百姓皆是其子民,灾荒之年州县官员不能及时赈灾,百姓为求生盗窃粮食实属本能,若依国法捕而杀之,则过于严苛。

宋仁宗出于仁义之心宽免因饥盗窃者,初衷令人钦佩。而司马光、杨安国维护法律权威与社会秩序之议,亦不无道理。无论是出于“礼”之孝道偷窃,还是出于“生”之本能劫夺,均涉及道德、人情与法律的复杂关系。而且,在古人看来,人命关天,使人的生命得以延续即是最大的天理,而法律不外乎天理和人情,故法律的实施必须有所节制,不可一味严苛。

类似饥饿致盗的罪刑争论,国外亦有。在梅纳尔盗窃案中,犯罪者梅纳尔

疾人),以及过失犯罪的人,同时明确规定谋反等“十恶”重罪不得适用赎刑。唐代所建立的赎刑体系,为后世所沿用。据北宋《册府元龟》记载,后晋天福三年,晋州发生了一起“王兴哥戏杀案”,王兴哥系未成年人在与邻家孩童玩耍时,失手用砖块击中对方面部,后对方因破伤风死亡。审案官员认为,王兴哥的行为属“戏杀”,是过失犯罪,并非蓄怨凶杀。后晋高祖据此下敕,将王兴哥“减死一等”,改判征铜一百斤赎刑,彰显了赎刑制度的仁恤精神。

明清时期,赎刑的适用发生了转变。明代创立律赎与例赎双轨制:律赎以《大明律》为依据,标准明确固定;例赎则以条例为补充,更为灵活,普通军民所犯大多数罪行均可适用纳赎。清初进一步将赎刑细分为纳赎、收赎、赎罪等类型,分别适用于官员、老幼废疾等特定群体以及过失犯罪者、官员亲属,此外还有律例之外的捐赎制度。清末,罚金与赎刑并行。罚金作为主刑普遍适用,不同主体的罚金数额一致;而赎刑的适用则具有身份上的明显差异。后来,罚金刑全面取代赎刑,这一古老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。

总的来看,赎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肉刑的残酷性,体现了一定的人道关怀。同时,它有效缓解了刑罚“执行难”的问题,节约了司法成本。例如,流刑需要长途押送犯人,耗费大量人力物力,允许符合条件的罪犯纳赎,则会大大减轻这种负担。同时,对部分案件采用纳赎或罚役,有助于缓解监狱的监管压力。古代赎刑的核心在于,通过经济或劳动手段替代刑刑执行,既贯彻了慎刑、仁恤的传统法律思想,又兼顾了社会治理的实际效果。这一思路与现代刑罚轻缓化趋势相通,对今天的犯罪治理仍具借鉴意义。

在我国现行刑法中,罚金刑是一种重要的财产刑。合理借鉴古代钱赎制度,构建易科罚金和罚金易科制度,具有

饥谨盗粮案里的礼法平衡——

悯其情却不弛其禁

韩伟

但此类案件常常具狱上奏,经中央刑部复核后予以酌情减罚。宋真宗时,蔡州三百余灾民因抢劫粮食获罪,论法皆应处以死刑。时任知州张荣、推官江嗣宗怜悯灾民处境,反复商议后,仅对为首者处以脊杖刑,其他参与者论以普通杖罪。宋真宗听闻该案的处理结果后,下诏予以褒赏,并遣派使者前往当地巡视了解,并颁发谕旨:百姓因遇灾荒食不果腹,不得已抢夺大户的存粮以求活命,不应依据盗法从重惩治。天圣初年,有地方官奏报,有人因饥谨盗劫米而伤主,宋仁宗称:出于饥谨而盗劫米粮其情可矜,但因而伤害主人确有罪过;尽管如此,饥民实属无知,不过是因食粮不足所迫,可予以宽恕。天圣三年,陕西遭遇旱灾,类似案件屡屡发生,宋仁宗故颁发诏书:百姓因饥谨盗窃粮仓,只要未伤及主人皆可宽免死罪,处以刺配之刑,非首谋者再减一等。自此之后,各地百姓因饥谨盗窃,多获得罪刑矜减,很多人得以存活。

对此宽仁之政,宋朝部分官员不以为然,认为因饥谨宽免盗贼是“小仁”,反而会破坏法律权威和社会秩序。时任大理评事的司马光上奏谏言:贫困百姓因饥谨偷盗粮食、钱财,多凭朝廷敕令得到宽免,这种做法并不恰当。他援引《周礼》中记载的荒政对策,提出灾荒之年应减轻税赋,减缓刑罚,去除不必要的禁令,让百姓得以谋生,利于良善百姓。唯独对于盗贼,不仅不应宽免,反而需要严厉惩处。因为,灾荒之年盗贼本就容易滋生,若任其横行,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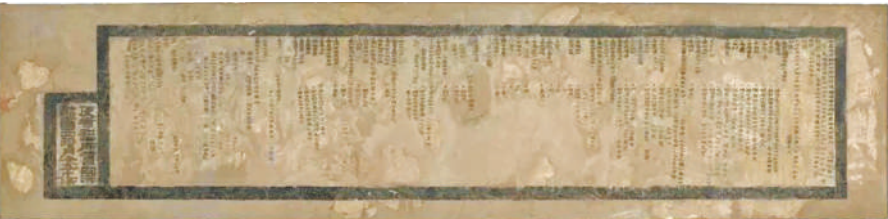
官、大辟五种刑罚分别规定了详细的赎免标准,明确墨刑可交纳一百铤铜抵免、劓刑二百铤、劓刑五百铤、宫刑六百铤、大辟千铤(“铤”为先秦重量单位,一铤约六两)。后世朝代也一直沿用钱赎,并不断细化赎免标准。如隋朝《开皇律》规定,九品以上官员犯罪,答十需赎铜一斤;杖一百需赎铜十斤;徒刑一年需赎铜二十斤;流放一千里需赎铜八十斤;死刑则需赎铜一百二十斤。不过,钱赎并不只限于铜,各朝各代根据经济情况有所调整。春秋时期可以用犀甲或盾牌抵免刑罚;秦汉时期出现用黄金、铜钱、粮食等混合抵免刑罚的方式;明朝赎物更加多样,允许以宝钞、铜钱、银子,甚至马匹、草料、米粮等抵免刑罚;清朝主要用银子,但也允许用粮食或牲畜抵免刑罚。

役赎即通过服劳役折抵刑罚,主要为无力承担巨额赎金的普通百姓设置。《睡虎地秦墓竹简·司空律》明确规定,如果罪犯无力支付赎金,可以通过服劳役抵偿,每日折算八钱。唐代建立了系统的官役折刑制度,允许无力赔偿官府损失的人,通过服劳役折抵刑罚。明代的罚役(即刑罚的替代)形式更加多样,包括屯种、运粮、运灰、炼铁等。清代基本沿用了明代的做法。罚役既惩戒了罪犯,也为国家节省了监禁管理的成本。

功赎主要适用于官员及贵族等特权群体。比如,清代盛行的效力赎罪,犯罪的官员、贵族等可以通过到军队服役,或者主持修城、治水等重大工程将功补过,抵消刑罚。

赎刑的适用范围随朝代更替不断调整,各朝刑律均有明确规定。周朝时,赎刑主要适用于疑罪,即犯罪事实存疑、难以认定的案件。秦汉时期,赎刑的适用不再局限于“疑罪用赎”的原则。汉武帝时期曾允许死罪犯人缴纳高额钱财免除死刑,交得起的自然都是富贵人家。到了唐代,赎刑的适用对象限于官员及其亲属、特定群体(老年人、未成年人及残

《四时月令诏条》:丝绸之路上的法律印记



《四时月令诏条》泥墙墨书,悬泉置遗址F26房址出土,现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。

在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F26房址的一面破损泥墙上,一块墨书题记格外醒目,它就是《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》(下称《四时月令诏条》)。悬泉置遗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莫高镇悬泉置村东南1.5公里处的戈壁滩上,“置”是汉代的官方驿置,设立于汉武帝时期,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站点,承担邮驿传递、官使接待与物资转运职能,负责传递长安与西域间的官方文书,接待中西往来的商贾使臣。1990年至1992年,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全面清理发掘时,发现了这块向下倒塌、支离破碎的泥墙题

记,经文物保护专家拼合修复后得以还原。

《四时月令诏条》全文101行,约1600字,字体为隶书,行与行之间以朱色(赭色)界栏分隔,四周画有较宽的墨线界栏,修复后通长222厘米、宽48厘米,1992年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,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、最完整的时令生态保护专项法律文书。

《四时月令诏条》是在汉平帝元始五年(公元5年)五月甲子朔丁丑(5月14日)由王莽奏呈、以太皇太后的名义颁布的,内容涵盖保护林木、动物、水、土等各方面,要求人们遵循自然时

序,并依据时令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。《四时月令诏条》由三部分组成:题记开头说明朝廷下达诏令的缘由“太皇太后诏曰:往者阴阳不调,风雨不时……”表明颁布此诏的目的在于让人们的生产生活遵循自然时序。随后将一年四季十二月的宜忌逐条列出,上半部分写着“法条”,下半部分对“法条”作出进一步解释,壁书左下角落外侧用醒目的大字写着:“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”,这样,途经驿站的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这部“环保法”,壁书广而告之和警示的作用由此凸显。

《四时月令诏条》的颁布实施和执行力度都很大,其保护生态环境的实际成效毋庸置疑。首先,它将农时耕作规范上升为国家法律,体现国家意志。其次,它具有较强的操作性,“诏令”部分的法律条文并不是“月令”的全文,而是摘录了“月令”中与人民生活劳动有关的内容。同时,“诏令”部分除了规定的50条,还增加了更加直观详细的解释性内容,并以“谓”的形式呈现,使得许多条目具



法意

（作者单位:华东政法大）



印象